

# 宋《江阴志》的修纂、版本源流及文献价值

地方文献组 杨印民

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成熟时期，方志修纂在内容和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并趋于定型。宋代所修地方志，据张国淦先生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统计，共约 761 种，现今存世仅见 36 种，其余均已散佚，殊为可叹。存世的 36 种宋志中，5 种为全国性总志，31 种为地方州县志。<sup>①</sup>宋代地方志因成书时间早，存世稀少，史料价值高，故而弥足珍贵。

## 一、宋《江阴志》的修纂与版本源流

据《中国古方志考》，今江阴地区最早的方志主要有北宋早期所修江阴军《旧经》、大中祥符间宋皋所修《[祥符]江阴军图经》及可能成书于北宋中期的江阴军《图经》，均已亡佚。<sup>②</sup>但笔者臆测三书或可能为同一种书，或者后二种为同一书，<sup>③</sup>此尚待进一步研究，不作确论。

江阴历史上首部以“志”命名、体例相对完备的地方志书实为南宋绍熙五年（1194 年）成书的《江阴志》，时江阴为军，故又有称其为《江阴军志》<sup>④</sup>。军志即是记一军范围的志书，通常由军长官知军主修。据目前所知，宋代各地所修军志已全部散佚，故而本次对于宋《江阴志》的辑佚尤显重要。

绍熙《江阴志》十卷，宋江阴知军施迈主修，教授郑应申、知县徐纲纂修。

迈，浙江吴兴（今湖州）人，朝奉郎，于绍熙四年出任江阴军知军。应申，从事郎，于绍熙三年任江阴军学教授。纲，朝散郎，于绍熙三年任江阴县知县。绍熙四年，施迈嘱教授郑应申纂修邑志。应申“搜抉载籍，网罗散亡，区分类别，条贯有截，为江阴志一十卷，凡三十二门。自秦汉以来迄于今千八百年江阴之故赫然如揭日月”。知县徐纲亦“相与搜猎为书”<sup>⑤</sup>，使邑中文献赖以不坠。

是志凡 32 门，或称“施志”、“绍熙志”，通称《江阴志》。南宋尤袤所著《遂初堂书目》“地理类”有《江阴志》。《宋史》卷二百四《艺文志三》有“郑应申《江阴志》十卷”。俞巨源《序》称誉：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其目井井也。”

绍定《江阴志》十一卷，宋江阴知军颜耆仲、史寓之主修，教授郭庭坚，嘉定县主簿蒋汝通纂修。

耆仲，福建龙溪人，朝奉郎，南宋绍定元年（1228 年）九月出任江阴军知军。寓之，朝奉大

<sup>①</sup> 张国淦：《中国古方志考》，中华书局 1962 年。

<sup>②</sup> 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页 268-269。

<sup>③</sup> 参阅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·叙例》：“盖新旧之名，乃引用者临文所酌加，本无一定之标准。且图经乃地志之通名，则泛称图经者，在本书或名志或名记，或更有其他之名目，亦未必果名图经也。”页 3。

<sup>④</sup> 徐复、季文通主编《江苏旧方志提要》即称其为《[绍熙]江阴军志》，页 164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。

<sup>⑤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卷九《名宦·学职·宋教授·郑应申》。

夫，绍定三年十月任江阴军知军。庭坚，宋江阴军杨舍镇人，宝庆二年（1226年）进士，迪功郎，绍定元年任江阴军学教授。汝通，字亨伯，自号逸堂，江阴人。绍定二年进士，迪功郎、新平江府嘉定县主簿，后转从事郎、监潭州南岳庙，著有《引睡集》、《质疑》等。

先是，绍定三年，知军颜耆仲因绍熙间所修《江阴志》“间有考之未详、略而弗备者，况历三纪之余，时异事殊”，聘郭庭坚、蒋汝通纂修新志。郭、蒋“采掇见闻，推扬事类，登崇洪锯，剔拨宦微，纘承大业，俾弗脱绝。”<sup>①</sup>并依前志“审订是非，搜访遗逸，因其编目随类附入，视前志为稍详”<sup>②</sup>，当时参与校订工作的还有学宾曹崧、掌书吴天成、学谕贡士丁时发。同年成书，总十一卷，仍为32门，通称“绍定志”。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征引该书则径书为“绍定新入”、“绍定添入”。

绍定三年秋，颜耆仲离任，史寓之继任江阴知军，军事上经划江防，社会教育上推行乡饮酒礼，所谓“军旅俎豆，皆重事也”，这些皆为前志所不载。绍定五年（壬辰，1232年），史氏以朝奉郎、签书江阴军判官石祖文总其纲，以国学进士蒋汝通增修，同年修成。<sup>③</sup>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征引该志称“绍定续添”或“绍定壬辰续添”。

此志后来散佚，所幸明人黄傅修，方谟等纂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一书存有该志目录：卷一总叙、分野、风俗、形势、道里、县镇、城社。卷二学校贡院附、刑狱、户口、物产、财赋。卷三郡守、军治、官廨。卷四年表、职田。卷五坊市、仓库场务、酒坊附、营寨教场附、亭馆递铺附、桥梁。卷六山阜、河渠堰、闸、井、泉附。卷七人物、科名。卷八古迹、寺观、祠庙。卷九碑刻、题咏上。卷十题咏下。卷第十一题咏绍定续添。<sup>④</sup>

已如该志目录中所注明，卷十一即为绍定五年后续添入的内容。绍定志重点详载有三大方面：一江防，一民政，一学事。明人饶玄德《重刊序》云：“其于营屯之设置，攻守之备具，七百里江面历历掌握中，无尺地非其所经理；民间闸堰之起筑、租课之耗益，二百里郊圻物物在胸臆下，无一夫非其所料理。以致学校之事皆然，真可见古人为政之用心矣。”<sup>⑤</sup>

《江阴志》经绍定五年续添之后，至景定间和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又分别增补添入一些内容。因景定间江阴知军的更换相当频繁，五年换了八任知军，所以无法知道当时的主修者是哪一位，具体续添者姓名更是不详，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征引其内容称“景定续添”，而称咸淳三年添入内容为“咸淳续添”或“咸淳丁卯添入”。据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卷十《宦迹》征引《江阴志》，咸淳三年江阴时任知军为赵孟奎，他自咸淳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，三年七月八日准告磨勘离任。期间履历记载十分详尽，不惜笔墨。而其后的继任者仅书有“陈纯仁”三字姓名，其余一概未书，这一切说明“咸淳续添”的主修者为知军赵孟奎，具体续添者姓名亦是不详。

<sup>①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卷九《名宦·学职·宋教授·郭庭坚》。

<sup>②</sup> 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卷一《历代序文》，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间抄本。

<sup>③</sup> 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卷一《历代序文》。

<sup>④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卷十四《诸志序例次第》。

<sup>⑤</sup> 《[弘治]江陰縣志》卷十四《諸志序例次第·洪武中重刊宋志序》。

颇值一提的是，宋以后志书征引上述内容时，皆称“续添”、“添入”，而不称“续修”，可见皆是以绍熙所修《江阴志》为蓝本。事实上，后世一直将这些内容统称为《江阴志》，甚少将各部分独立分割开来。正如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作者黄傅所言：“宋志一书，肇创于绍熙甲寅而续述于绍定壬辰。郡志旧称散佚，惟咸淳本仅存。则毗陵、江阴之故莫究于绍熙、绍定之编也。”<sup>①</sup>即是其认为后世已经很难区别哪些内容来自绍熙《江阴志》，哪些内容来自绍定《江阴志》了。明人高宾在正德十五年刊行的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序中说：“志自宋绍定后无续之者”，应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然而，南宋绍熙、绍定年间所修的《江阴志》，至元朝初期就已“遗阙泯漫”。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，江阴路儒学教授、浙江永嘉人朱子昌将四处搜集而得的“绍定志”校正重刊，其题识曰：“江阴旧有郡志，遗阙泯漫。至元丙戌，分教于兹，重加校正，命工钁梓，始为全书，盖存古也。”<sup>②</sup>明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江阴知县饶玄德（江西宜黄人）再次重刊“绍定志”，其序曰：“惜乎本境兵燹焚荡之余，架阁无文，厅壁无记。于是招集遗老，延致儒流，胥会于学宫，搜葺散亡，掇拾残断旧书，前后续编，总一十三卷。求之数家，晚得张彦翔所藏本讎校，始克稍完，誊录钁刻。”<sup>③</sup>

此饶氏序中所言“张彦翔所藏本”是指前文黄傅所言的宋“咸淳本”，还是元至元二十三年朱子昌校正“绍定志”刻本，实不得而知，但饶玄德洪武九年刊本当是宋《江阴志》被重刊的最晚记录。明正统间所编《文渊阁书目·旧志》尚著录有“《江阴志》五册”，但不知此五册《江阴志》为何种版本。

然诸版《江阴志》最迟可能于明正德、嘉靖以后全部散佚无寻，至清人朱廷鋐续纂《[康熙]江阴县志》时更慨叹说：“考旧志自宋以来，诸本俱亡失不可问。”<sup>④</sup>《[乾隆]江阴县志》纂修者蔡澍亦云“宋元旧志，邈不可问。”<sup>⑤</sup>

此后，自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江阴县丞贺子徽修成《江阴县志》（已佚），迄于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陈思修、缪荃孙纂民国《江阴县续志》，再至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王维屏所撰十五卷《[民国]江阴志略》，先后凡十余次续修，皆谓江阴县志，迥非宋《江阴志》原貌。正如《[嘉靖]江阴县志》纂修者张袞于《重修江阴县志序》所云：“宋有刻本凡十卷，教授郑应申、郭庭坚为之。是时江阴为军。元至元间尝一翻刻，皆仍故也。其后入我国朝，继轨而修，有若贺子徽氏、颜瑄氏种种而出，于是称县志焉。”<sup>⑥</sup>

<sup>①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，明正德十五年（1520年）刻本。

<sup>②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卷十四《诸志序例次第·至元中重刊宋志题识》。

<sup>③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卷十四《诸志序例次第·洪武中重刊宋志序》。

<sup>④</sup> （清）龔之怡修，沈清世續修，（清）陳芝英纂，朱廷鋐等續纂：《[康熙]江陰縣志》，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刻本。

<sup>⑤</sup> （清）蔡澍纂修：《[乾隆]江陰縣志》《序·志館告白》，乾隆九年刻本。

<sup>⑥</sup> （明）趙錦修，張袞纂：《[嘉靖]江陰縣志》，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刻本。

## 二、宋《江阴志》的文献价值

江阴位今江苏省南部，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北端，古称暨阳，别称澄江、澄川。江阴历史悠久，素有“延陵古邑”、“春申旧封”之称。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置暨阳县。南朝梁绍泰元年（555年）废县置郡，建治君山之麓，因地处长江之南，遂称江阴郡，为“江阴”名称之开始。隋唐废郡，唐置暨州，五代南唐置江阴军。宋代，江阴先为军，同下州，隶两浙路，“熙宁四年，废江阴军为县，隶常州。建炎初，以江阴县复置军；绍兴二十七年废，三十一年，复置。县一：江阴”<sup>①</sup>。入元以后迄至明清，江阴或为路、为州、为县，建置几经变化，兹不赘述。

综上所述可知，有宋一代，江阴行政区划建制虽在军、县之间屡废屡置，但主体为军时间最长。军，初设于唐代，唐在置兵戍守之地设军，五代因之，迄宋，正式设军一级行政区划，通常于边关阪塞、道路冲要、山川险僻多聚寇攘之所，以及农民武装起义频发地区设军，往往驻扎军队，以控制形势。军又有军和军使之别，军辖县，与州、府、监同级，隶于路。军的行政长官是知军事，简称知军。军使低于军，基本相当于县，只是以种种缘故，需要增重事权，才加军额，其行政长官为知县。<sup>②</sup>江阴在宋代为军，而非军使。

江阴地处江尾海头，长江咽喉，自古就是江防要塞，兵家必争之地，所谓“江阴北抵江淮，东连海道，自六朝与五季，皆为置兵之地”<sup>③</sup>。南宋时期，江阴因地濒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，地理位置尤显重要，“是邦密扈神京，地濒冲要。”<sup>④</sup>“负海濒江，外控临于淮甸；连吴引楚，内屏蔽于京畿。”“虽江阴之小垒，实浙右之要区。”<sup>⑤</sup>宋代江阴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端平二年（1235年）十月的一通“省札”记录了当时江阴驻军的军种、数量以及当地政府需要供养的文武百官及其他成员等内容：

照得本军有管厢军、禁军、水军、土军、递铺兵士、牢城、作院、敢勇军等共壹

千六百余人，及见任寄居文武官、宗室、孤遗、归朝、归正、养济人等，又有沿江渡

口壹拾捌处监渡机察，军兵券米及造甲工匠食米、编拘管人囚粮并修造公廩，不时批

支。<sup>⑥</sup>

江阴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，境内水系四通八达，“江环海绕，巨艘长棹之毕输。”水产资源亦十分丰富，有鱼盐之利，当地居民生活较为丰足，“人近珠犀之市，颇亦富饶；郡居鱼蟹之乡，未为岑寂。”<sup>⑦</sup>商业贸易往来频繁，特别是与日本、高丽等国的海外贸易一度相当兴盛。北宋

<sup>①</sup> 《宋史》卷八十八《地理志四》。

<sup>②</sup> 参阅李昌惠《宋代的军、知军、军使》，载《上海师範大學學報》1990年第3期。

<sup>③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八《形勢》徵引《江陰志》。

<sup>④</sup> （宋）尤焞：《寶祐乙卯重建廳記》，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八《文章》徵引《江陰志》。

<sup>⑤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五《文章》徵引《江陰續志》。

<sup>⑥</sup> 《端平二年十月省劄：從本軍所申，許明收郡用供軍米肆鬥，指揮系知軍史省門歸之任內。》

<sup>⑦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五《文章》徵引《江陰續志》。

时期，王安石就有诗：“黄田港口水如天，万里风樯看贾船。海外珠犀常入市，人间鱼蟹不论钱。”

<sup>①</sup>至南宋，时人杨端叔在其文章《君山塔院记》中亦言江阴“海潮以时，琛贡来航，市有鱼盐，舶有珠犀，是天下之富也。”<sup>②</sup>位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，因通往黄田港，绍熙间“商船倭舶每岁辐凑，巨舳比居，人烟翕集，故为市，亚于城闕焉。”然自嘉定二年（1209年）高丽、日本船不到，“市井萧疎，非复曩日矣。”<sup>③</sup>

江阴军虽地踞冲要，但界域狭小，“昔者为邦，仅曰雷封之小；今焉升郡，亦惟斗垒之微。”<sup>④</sup>所辖仅江阴一县，县止十七乡，一军不及当时苏州、常州一大县，然每岁“岁额却多三倍”<sup>⑤</sup>。故而财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困扰江阴军地方政府的重要问题。早在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，江阴知军王棠《乞截留秋苗以为军储札子》就言：“今本军俯临大江，自昔为屯戍之地，而库无储金，廩无余粟，平时旋营尚容措画，万有一警，何足支持？全藉内郡拨发钱穀以实边垒。”绍熙间，知军施迈亦向上级诉苦说：“江阴名虽为军，财赋所入不及一壮县。官吏、宗子俸仰给，而养兵之费往岁失于申请，不以省额窠拨，一切取办、上供、送使、贡发不费。守是邦者，务从约蓄，亦其势然也。”<sup>⑥</sup>财政收支的捉襟见肘困窘局面可从绍熙四年（1193年）施迈所上《乞减岁额科名钱札子》中窥见一斑：

照对本军每岁额趁上供经制钱 117873 贯 502 文，月桩大军钱 79227 贯 552 文，肆分余本钱 25000 贯文，遇闰月在外，三项共趁额钱 222101 贯 54 文。又有合发杂色窠名官钱及转运司打船钱等，并每月官兵请俸、春冬衣赐近 18 万余贯，壹岁发纳支遣共 40 万余贯文，收簇官兵廩食不在此数。

迈自到官以来，将壹岁所入之数计之，不了所出十分之六，皆是酒税课利。亏欠除其他拖下官钱并支遣外，且以上件三色官钱自累年以来止今年五月终，计有积欠下淮西总领所大军钱 14 万余贯，及行在并淮东总领所等钱 86000 余贯文，肆分余本钱 16000 余贯文，己上共拖下钱 242000 余贯文。

江阴军原系常州属邑，因累废累复，不曾申明朝廷支降，“官兵俸粮衣赐，皆是凿空取办。”<sup>⑦</sup>这也是给江阴地方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原因之一。时人有句言江阴现状：“征商税亩，特如剧

<sup>①</sup>（宋）王安石：《予求守江陰未得，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》，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五《文章》徵引《江陰志》。

<sup>②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八《文章》征引《江陰續志》。

<sup>③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三《坊鄉》征引《江陰志》。

<sup>④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五《文章》征引《江陰續志》。

<sup>⑤</sup> 明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《宦迹》征引“紹定續添”

<sup>⑥</sup> 《知軍施邁紹熙四年乞減歲額科名錢札子》。

<sup>⑦</sup> 《端平二年十月省札：從本軍所申，許明收郡用供軍米肆斗，指揮系知軍史省門崗之任內》。

邑之封；送使留州，仅足公家之用。”<sup>①</sup>前一句是事实，后一句则未免牵强。

前述史料中，诗人所描述江阴表相上的富庶丰足景象，与当政者诉苦财政窘迫的现实遥相对应，里面包含了中央、地方财权利益的分割问题，发人深思，对今天的执政者仍有现实借鉴意义。

江阴文化底蕴深厚，人材辈出。宋人俞巨源为《江阴志》作序褒奖道：“其山川甚秀，其生齿甚繁，其风物甚雅。而名公贤士大夫落落继出，如骑星辰；通德之门，奂焉相接也。”<sup>②</sup>明《[洪武]江阴县志》主修贺子徽更是赞不绝口：“是邑居江之南，海之北，山明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藹然文物之区，蔚然诗书之藪，蜚英翰苑，驰名缙绅，皆表表令闻。”<sup>③</sup>宋《江阴志》保留了大量价值颇高的宋代江阴地方史料，记录了有关江阴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宗教、军事、人口、风土等发展演变的重要史事，极具文献、史料价值。

众所周知，宋志重文献征引，元志重资料考订。《江阴志》一书的突出特点是凡列一山一水一人一物，多征引他书，甚至有整篇文章录入，而作者自身不作更多陈述，做到事必有据。惟因如此，《江阴志》对于文献保存的价值意义甚大，其于行文中征引的大量文献，很多早已散佚，其中的残文赖《江阴志》得以保存下来，令今人得以一睹其部分真容。如《旧经》、《[祥符]图经》、《十国纪年》、《南徐州记》、《源山须知》、《条山记》、《十道四蕃志》、《太平摠类》、《高丽入山传》、《葛氏家谱》等等。

其次，宋《江阴志》保留了大量其他书籍阙载之诗文，堪称孤篇，大部分文章未见收于各类文集和总集，未收入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文》等有几篇（首），如范仲淹《明教院重建释迦殿记》等文章，不仅有极高的文史价值，而且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和史学宝库。又如《慈幼局记》、《和丰仓记》、《宽征记》、《便民浚后河记》等文章，对研究当时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都有可资参考价值。特别是在“宦迹”一门，留存了如《知军王棠乞截留秋苗以为军储札子》、《知军施迈绍熙四年乞减岁额科名钱札子》等十余通南宋时期江阴军地方官奏札，皆为其他文献所不载，对研究江阴宋时史事，以及宋代地方行政、财政、贸易等状况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江阴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，自北宋早期所修江阴军《旧经》、《图经》等书开始，迄及民国陈思修、缪荃孙纂《江阴县续志》，及之后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王维屏《江阴志略》，先后修纂过十余部志书。这些版本各异的志书，记载了江阴及其治域千余年的发展历史，其中不乏通经古今的范作，且史实记述堪称详备，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本课题对早已散佚的宋《江阴志》进行辑佚和整理校勘，也是丰富江阴古城文化内涵的一件大事，宋时江阴地情之概况，人文之精萃，先辈业绩德行，无不跃然志乘。既能供为政者咨考，亦可为文史研究者阁藏，发挥其鉴往察今，惠及后世的重要。

总之，本课题对于整理发掘江阴地方历史文化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，对于古籍文

<sup>①</sup> 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卷十五《文章》征引《江阴续志》。

<sup>②</sup> 明永乐《常州府志》卷一《历代序文》。

<sup>③</sup> 《[弘治]江阴县志》卷十四《诸志序例次第·贺子徽：续修序》。

献的抢救、保护、整理和研究，以及对于促进历史学、历史地理学、方志学、文学史、文献校勘、目录学等诸多学科的建设，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正所谓，零圭碎璧，犹可珍惜；残膏剩馥，沾溉无穷。